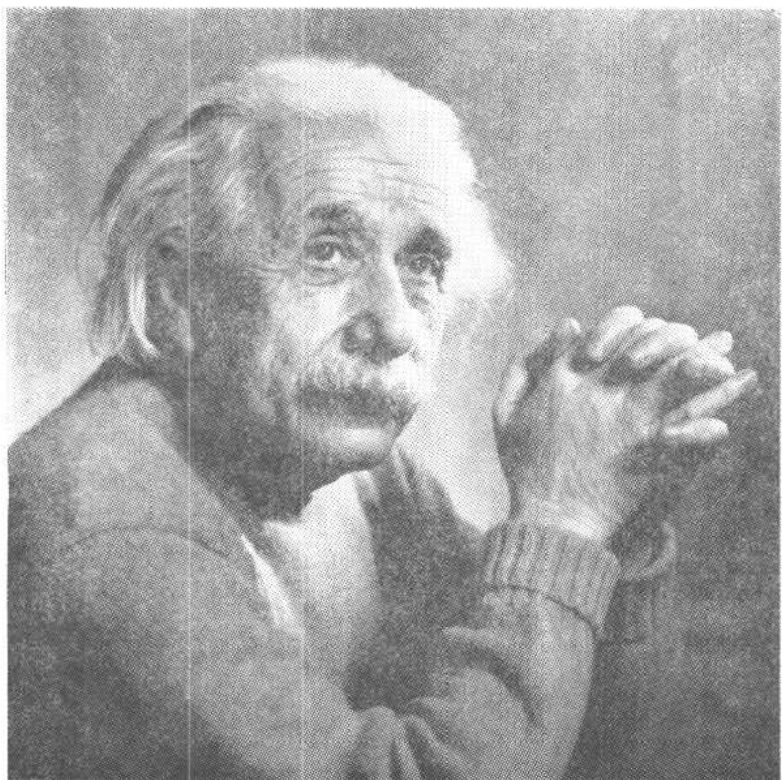


2552/
54.3

爱因斯坦文集

第 三 卷

商 务 印 书 馆



© J. S. Sackman
Albany

Long and Short: Ideas and the Future of Science
J. Sackman

Ich danke Ihnen für Ihre Aufklärungen. Mit dem, worüber Sie
meinte ich die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Physik. —

Das Problem, von welchem auch die Intelligenz dieses
Landes gestört nicht, ist ein sehr ernstes. Es ist der
reelktinären Plötzlichen dieses Landes-gehung ein-
Vorgabeung einer diesem Gefahr das Intellektuell gegen
die Intellektuellen Bemerkungen. misstrauische zu
machen, ist der Basis dieses Erfolges, sind die
daraus, die jede Lehre zu mündigen, sind
die nicht Gegebenen aus allen Stellungen zu verdrängen,
d. h. ~~entgegen~~ entgegen.

Was soll die Minderheit der Intellektuellen dann
gegen das Übel? Aber ihre offen verstanden sind über
reorganisieren Weg der von - expropriation der Landes-gehandelt.
Teile Intellektuelle, die vor ein-^{von} Land der einmüßig ^{von} gegeben
wird, müßte jede Aussage vorwiegend, d. h. Land-^{von} sein.

第三卷选编说明

这一卷选编的内容主要是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反映他的一般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科学观、经济观、教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以及他对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共 164 篇。此外，还有第一卷的两个补遗，共 79 篇，其中有爱因斯坦给 M. 贝索的信 58 封。最后是两个附录：《爱因斯坦生平 and 历史背景年表(1879—1955)》；《爱因斯坦著作目录》(共 809 题)。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在对本卷所涉及的爱因斯坦的主要政治表现和有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言论作一简单介绍。

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他先后生活在帝国主义政治旋涡中心的德国和美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要负怎样的责任。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萦怀于心的是希望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他向学技术科学的青年指出：“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①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②

① 1931 年 2 月 16 日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见本书 73 页。

② 1949 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见本书 271 页。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①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榜样的作用是重要的，而他自己就感到有责任做出榜样。因此，对他所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②。

这突出地表现在 1933 年他同猖獗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斗争上。当时他的挚友冯·劳厄为他担心，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好。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③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类历史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诚挚的责任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就不可能有这样鲜明的立场。

* * *

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他却目睹了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的首要问题，他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论。1960 年出版的，由他的遗嘱执行人 O. 那坦和 H. 诺尔登编辑的文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相当于中文将近一百万字的篇幅。他对政治问题第一次的公开表态，是 1914 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次战争，列宁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

① 《人的真正价值》，见本书 35 页。

② 1953 年《人权》，见本书 321 页。

③ 1933 年 5 月 26 日给劳厄的信，见本书 112 页。

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九十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这次战争,在包括他本人在内仅有四个人支持的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上签了名,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①。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受到了各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一小撮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恶毒攻击。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特别是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所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给了他极大的幻想。这段时间,他到处作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但这些幻想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了,而成为现实的却是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纵容和支持。紧接着是意大利并吞埃塞俄比亚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西斯逆流到处泛滥,整个世界都受着侵略战争的威胁。

1933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纳粹篡夺政权后,就对德国工人阶级全面猖狂进攻,并且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纳粹对内的法西斯暴行和对外的战争叫嚣,使一向讲人道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鼓吹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终于完全改变了态度,挺

^① 见本书3页。

身而出,同这帮吃人的野兽进行殊死斗争。1933年7月20日他写给法国青年 A. 纳翁的信^①就表明这一转变。

出于对法西斯的高度仇恨,他对1936—39年的西班牙内战非常关怀,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表示极为不满。1938年10月10日给 M. 贝索的信^②中对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年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 L. 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③,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会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德寇征服欧洲14个国家后倾巢东犯苏联时,他对苏军的英勇抗战,始终十分关切。1942年10月25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④,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和战前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号召各国人民全力支援苏联人民的抗德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爱因斯坦对战后的国际形势产生了新的幻想。他幻想着战时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会万古长存,人类可望永无战争了。但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竟悍然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以牺牲二十多万和平居民的生命作为其称霸全世界的讹诈手段,这给了他意外的打击,特别由于他是原子能基本原理的发现者和制造原子弹的创议者,在美国他竟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使他感到无限痛苦和矛盾。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他就愤慨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

① 见本书 115 页。

② 见本书 468—469 页。

③ 见本书 177—178 页。

④ 见本书 187—189 页。

但和平却还没有。”^①

由于意识到核战争(当时称为“原子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怎样才能防止核战争?怎样才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证各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利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呢?这就是他战后最关心的大问题。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刊《原子科学家公报》,要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严厉警告一切企图以核讹诈来玩火的野心家。他曾寄希望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建议把联合国大会改组成为他多年来所幻想的世界政府。^②可是他没有料想到这个建议在当时只能有利于美国的霸权主义,会使它依恃核讹诈以实现称霸全世界的野心得到合法化。因此,当这个建议一发表,立即遭到各方面强烈的反对。但使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他的世界政府理想没有现实条件的,还是1947年和1948年初英美两国政客们发动的准备对苏联搞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叫嚣,他们公开宣传要趁苏联还没有掌握原子弹之前,先用核战争讹诈来制服它。为防止这种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爱因斯坦大声疾呼:“要对美国公众强烈呼吁,在还未采取不可改变的措施之前,在事态的进程还不是无可挽回之前,对走向预防性战争的发展,应当动员强大力量来加以反对。”^③通过这场斗争,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当时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必须全力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爱因斯坦虽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示不满,但对它的民主制却比较赞赏。战后的冷战年代里,美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对外实行以核讹诈为赌注的侵

① 见本书205页。

② 1947年9月给联合国大会的信,见本书236—240页。

③ 1948年4月1日给H.夏普莱的信,见本书257页脚注。

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内逐步走向法西斯化。1950年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这种发展更是变本加厉。这使爱因斯坦意识到，在美国，一切仿佛都在步当年纳粹德国的后尘。因此，他向美国公众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而且也是美国国内侵犯公民权利和学术自由的法西斯瘟疫的“病根”；美国反动政客所以要在美国人民中间制造“恐苏”、“恐共”歇斯底里，无非想借此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反复号召美国知识分子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抵抗法西斯奴役的斗争任务，应当不信任本国的反动政府，不服从一切反动的法律和政令。1953年，在给一位受到美国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侦讯的教师的信中，他激昂慷慨地呼吁：“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总之，他必须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当得到的，决不会比那种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好多少。”^①这封信在报上一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它成为美国正直知识分子反对法西斯奴役、保卫民主权利的战斗号角。

爱因斯坦晚年对美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极为不满，在他逝世前五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②当时美国法西斯头目麦卡锡承袭希特勒衣钵，大骂爱因斯坦是“美国的敌人”。早在1945年，就有众议员在国会会议上提出要对爱因斯坦进行法律起诉。在他逝世前十多天，美国有个法西斯组织在刊物上大骂爱因

① 1953年5月16日给W.弗劳恩格拉斯的信，见本书316—317页。

② 1954年11月答《记者》杂志问，见本书325页。

斯坦是“颠覆分子”。爱因斯坦对所有这类加到他头上的打击毫无畏惧，一概采取横眉冷对的态度。

因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而迁居美国的爱因斯坦，1955年4月18日，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美国法西斯叫嚣声中怅然离开人间。他临终前几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讲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美国的侵犯公民自由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重新武装西德问题。正是法西斯危险和战争危险这两个问题，使他晚年忧心忡忡。

* * *

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在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这清楚地表述在他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中：“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①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而且私人资本的垄断“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②他于1949年5月在美国进步刊物《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

① 1938年9月《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见本书159页。

② 1949年5月《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见本书271—272页。

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①

爱因斯坦在瑞士求学时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同犹太民族的传统是一致的。因此，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他立即表示支持。1919年秋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苏俄实行“饥饿封锁”，爱因斯坦就领导德国知识分子发表抗议声明。他后来回忆说：“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必然的事。在当时俄国的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只有坚定的少数人承担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关心人民幸福的俄国人，在当时存在着的条件下，自然会同这些少数人合作，并且顺从他们，因为要不然，就不能达到这次革命的直接目标。对于一个独立的人来说，这确实需要暂时地、苦痛地放弃他的个人自由。但我相信，作这种暂时的牺牲，我自己会认为是我的责任，会把它看作是害处较少的。”^②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年11月德国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爱因斯坦热烈欢呼这次革命，在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就给他在瑞士的母亲写了两张洋溢着喜悦心情的明信片：“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象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③这个时期，他参加过一些工人的讨论会，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尽可能“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

① 1949年5月《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见本书273—274页。

② 1950年3月16日给S. 胡克的信，见本书285页。

③ 1918年11月11日给母亲的明信片，见本书6页。

劳动者沟通起来”^①。象他这样热情地对待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在当时西方的著名科学家中间只有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1872—1946)可以媲美。

同时，他对马克思和列宁都抱有很大敬意，认为他们都是为社会正义而自我牺牲的伟大人物。他把马克思同斯宾诺莎，甚至同摩西并提，认为他们都是热爱正义和理性这一犹太民族优秀传统的体现者。^②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他说：“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幻想阶级调和，并且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少数人的独裁。他象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论者那样，对自然界的看法基本上是唯物的，但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却基本上是唯心的。他认为在人类的社会、历史领域里是建立不起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因为科学只研究存在，而不涉及价值和目标，而理想社会的目标，古代圣贤已经提出来了，科学只提供实现这种目标的工具和方法。尽管如此，他的社会观也还是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的，他在三十年代初写的《社会和个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篇从头至尾闪烁着光彩的文章，在那里，他强调：“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④

* * *

① 见O.那坦和诺尔登编：《爱因斯坦论和平》，纽约，1960年，第650页。

② 1930年10月9日《犹太共同体》，见本书61页；1938年11月《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见本书164页。

③ 见本书9页。

④ 《社会和个人》，见本书38页。

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是他在人生观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文章开头就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全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①他反对偶像崇拜，厌恶阿谀奉承，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②他犀利地揭露了当时在德国泛滥成灾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的盲目性，说这种人“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③对待人生态度问题，爱因斯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贯彻他的一生，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他的胸怀是坦白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一切虚伪、自私、享乐、专横都同他无缘。

爱因斯坦常说自己有很深的宗教感情，人们往往就以为他已沦为神学的俘虏。这显然是一种误会。他对宗教的发展进行过历史的分析，认为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④他对前两者都持否定态度，而只肯定“宇宙宗教”。什么叫“宇宙宗教”？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已讲得很清楚：“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

①②③ 1930年《我的世界观》，见本书42—45页。

④ 1930年11月9日《宗教和科学》，见本文集第一卷，第279—280页。

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① 就是说他所“信仰”的，是自然界的规律性和可知性，而不是拟人化的上帝。他还进一步指出：“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指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站得住脚的教义，……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②。显然，他所说的“宗教”，是指的“斯宾诺莎哲学中最清楚表示出来的一种感情的和心理的态度”；所以要沿用“宗教”这个词，只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③

爱因斯坦以虔诚深挚的热情追求真理，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人，特别是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因此，关于教育问题，他也发表过不少独特的精辟见解。1936年的讲话《论教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能够“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④。每个学生对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文化遗产，都应当“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你们的孩子们”，这样，“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⑤。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

① 《关于科学的真理》，见本文集第一卷，第244页。

② 1940年9月《科学和宗教》，见本书184—185页。

③ 1951年1月1日给M. 索洛文的信，见本文集第一卷，第525—526页。

④ 1936年10月15日《论教育》，见本书143页。

⑤ 《教师与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见本书47页。

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适应进步和变化。”^①他由自己青年时代的亲身体会,对当时窒息人的学校教育和教学方法深为不满。他十分赞赏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法拉第的创新精神,说,“对于我们,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可以说是同我们母亲的奶一道吮吸来的,它们的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②他认为,法拉第所以能够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提出“场”的概念,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因循守旧的“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的思想包袱”^③。

爱因斯坦一贯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同情和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为争取独立和民族平等的正义斗争。在美国,他尽力支援黑人的解放斗争。在德国,作为一个受虐待、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成员,他为自己民族争得生存权利而奔走呼吁。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说过:“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

① 1936年《论教育》,见本书144页;147页。

② 1940年5月15日《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基础的考查》,见本文集第一卷,第387页。

③ 1950年4月《关于广义引力论》,见本文集第一卷,第498页。

会持续下去,甚至在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以上所简单介绍的,无疑是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方面。当然,他也象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有他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局限性,这要根据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加以分析、说明,不可苛求。

* * *

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名字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熟悉的,并且是亲切的。我们不会忘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也不会忘记1937年他为“七君子事件”所作的正义声援。他一生中,虽然只是在去日本讲学途中于1922年11月14日和1922年12月31日—1923年1月2日来回路过中国,在上海停留三天,但这三天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写着: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可是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已开始觉醒,说在上海所见到的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使得近年来中国的革命事件(显然是指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勤劳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却是顽强的民族。^②作为一个外国科学家,在中国仅有的三天逗留中,对水深火热中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竟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只有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才有可能。

① 1938年4月17日《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见本书152—153页。

② 见本书20—21页。

* * *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这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稿,从开始编译到今天,度过十六个寒暑,历尽坎坷困顿;它的出版,是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进行一系列斗争的结果。由于爱因斯坦的光辉形象在我国科学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了林彪和“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实现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巨大障碍,于是他们南北呼应,效法希特勒当年的故伎,从1969年开始合伙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围剿爱因斯坦的恶浪。他们先后抛出两批所谓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黑文,极尽其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之能事。“四人帮”那个控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余党趁机强行霸占并无耻剽窃我们1966年以前编译的和写作的有关爱因斯坦的全部稿件。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最后在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正义支持下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申诉,译稿终于获得了出版的可能。可是,一部17万字的著作稿《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至今下落不明。

在“四人帮”覆灭后举国一致开始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这个文集得以公开出版之际,回顾以往那段辛酸艰险的历程,我们不禁深切怀念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深切怀念为我国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竺可桢同志;并且对所有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热情支持过这项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周培源同志、王淦昌同志、秦力生同志、李晨同志、邹国兴同志、何成钧同志、解俊民同志,以及其他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许多热心的同志,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有关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编 译 者

1978年3月于北京